

关于木心

楔 子

八十年代初，木心先生旅居纽约，重拾被中辍十余年的文学写作，并陆续刊载于美东地区的《中国时报》、《世界日报》、《华侨日报》、《北美日报》、《中报》。一九八四年，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推出“木心散文个展”专刊，震动彼岸文坛。该刊编者按如此描述：“木心作品在文坛甫一出现，即以迥然出尘拒斥流俗的风格，引起广大读者强烈瞩目，人人争问木心是谁，为这一阵袭来的文学狂飙感到好奇。”著名诗人痖弦并在台北文学会议中亲自击鼓朗诵木心先生的篇章。此后及至九十年代，台湾相继出版木心先生文集共十二册。

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纽约《中报》副刊《东西风》主编发起并主持“木心的散文专题讨论会”，与会者计有：郭松棻，旅美台湾小说家、联

合国高级翻译组资深翻译家；杨泽，旅美诗人、《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李渝，旅美台湾文艺史论家、纽约市立大学教授；林泠，旅美诗人；梁恒，旅美大陆学者、北美中文季刊《知识分子》主编；陈丹青，旅美画家。同年六月二十日，以上六位人士的发言文本在《中报》副刊连续三天整版刊出。

这次座谈会的举行，距今整整二十年。陈丹青在当年的发言中感慨道，对于木心先生，“全面的评价，远在将来，我相信是会越来越大的，那时，就觉得今天，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是一个值得回顾的日子”——今年，本社隆重推出木心先生在大陆的第一册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并全文付印二十年前在纽约举办的“木心的散文专题讨论会”文本，既属回顾，亦足前瞻，其意味深长的历史价值，自不待言。

木 心 的 散 文

专题讨论会

纽约《中报》文艺副刊主办

Centre Daily News, June 20. 1986 Friday

你不能孤绝地予以评价，你必须，
为了对照和比较，置他于古人之中。我的
意思是要把这种对比当作美学性批评
的，而不仅是历史性批评的，一个原则。
——〔英〕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具》

时 间：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下午

地 点：中报会议室

主持人：《东西风》主编

出席者：陈丹青 郭松桢 杨 泽

李 渝 林 玲 梁 恒

主持人：

《东西风》为了充实广大读者的艺术欣赏，推动华裔作家的文学活动，尝试举办专题座谈会，以后将在取得经验和效果的基础上，拓展这一设想和计划。

我们认为：一位优秀的作家，必然与不同层面的读者有着不同层次的内在联系，而又必然与文学同行依存着“疑义相与析”的学术契缘。因此，我们邀请了几位文学经验丰富的作家、评家，对近年崛起于海外文坛备受赞扬的木心先生的作品（此次以他的《散文一集》为对象）进行一次评鉴讨论。虽然限于时间和条件，还不可能做到周致详畅，然而我们希望有所裨益于读者们对一位作家的特性风格的理解和品赏，从而透视到文学潮流的客观规律的繁复性，和作家本身的主观因素的自为能动性，两者的深刻关系是十分饶有兴味而发人省思的——我们编辑工作者，在加强华裔作家共同构成的文学事业的整体功能上，尽一份媒介催化的作用，是应尽的责任，也是赏心乐事。

感谢各位应邀出席的女士、先生，尤其是远

道赶程而来的。而且大家都做了书面准备，严谨的风范，真诚的态度，我们深表敬意深为感动。现在就开始吧，请先按书面顺次发言，然后，随意即兴谈论。好吧，哪一位先发表高见？

一个异数

陈丹青：

评论木心的文学作品，是十分困难的，单要说明这个困难，就得长篇大幅。

他是个“异数”，双重性质的“异数”。木心自身的气质、禀赋，落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类拔萃，而偏偏落在最宿命地湮没个人才具的历史时期，本是注定了要枯萎夭折的，但他存在，而且成熟，沉默四十年，终于扬名海外。因此，《散文一集》的问世，于作者而言，是大转折的“起点”，这个“起点”还具有非个人性的意义，以后会显示出来，成为一种象征。而今他的第二本散文集即将出版，第三本诗集、第四本小说集将相继付印，新的长篇的作品正在写制，专题评论木心的文学

活动，是后事，是大事，是盛事。我们今天来座谈，我想，性质上是“发凡”，方式上是叙叙《散文一集》的读后感——即使是这样的性质和方式，我也深感《中报》文艺副刊编辑先生的热诚非常具有远见，又占了风气之先。

读《散文一集》，我先说两点体会：一、中国风骨；二、世界观念。这从字面上看是极平常的，而表现在二十四篇文章中就极不平常，就成为奇观。以控制文字的功夫而论，中国传统的规律、渊源，他履险如夷，举重若轻，以致那“浅出”之前的深入，深不可测。也就是说，种种警辟微妙的思维和意象，对于他，仅是深入浅出，蕴蓄着的精神能量，呈引而不发状态。在融会古典修辞与现代语汇的手段上，又表现得机智果断神完气足；他是文体家，独创一种精密、精确、精美的文体，绝不晦涩雕琢，领会与否，是读者自身素养的程度问题，在中国的古今散文系列中，找不到同类型的模式。然而，从木心的散文中，又可看到中国历代散文的神髓，辗转苍萃，到此别开生面。这就不期然而然地想起艾略特在《传统

与个人才具》一文中的那几句话，大意是：

“任何一种艺术的艺术，都不能独自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意义，对他的欣赏，在于品鉴他与过去的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既成的不朽杰作，在相互的关系之间，本已形成一个美好的秩序，但一件新的真正独创的艺术品纳入这个秩序之后，也就调整了原有的秩序。”

我觉得，我认为，木心的散文与中国的历代散文，便有着这样的关系。

再就是文章中的思想情操的内涵，作者观照印证事物，自取的位置始终是“世界的”、“历史的”。当木心的作品初始连续发表之际，在引起多方的赞叹中产生了普遍的惊讶：他对西方文化精神的“源”和“流”何其博识，而且体察精微，见解卓越，文笔又是如此现代风，完全不类蛰居封闭区域中人。要解答这个疑问，必得牵涉的因果太多了。不过，我想，世界文化的整体性，时代思潮的渗透力，对于高强的心智，人为的偏见所作的隔绝，是不能阻碍其敏锐的感应的，反而逼上尖顶，俯视平面，所见者就更大了。何况木

心家学根底正统扎实，自幼熟习希腊神话和《旧约》、《新约》，与儒释经典同为必修课程，接下来的数十年学问，在哲学、历史、艺术……各领域中所作的，一贯是世界范畴的探索，他的“常识”可算是丰富的了。但“常识”丰富并不是他的过人之处，他在文章中表呈出来的“神智器识”才是难以企及的，即就《散文一集》的序和跋为例，陈义之高，含意之深，已够读者体味再三；当然在其他篇章中，自有更多至理和玄思的阐发，襟怀和志趣的流露。我的所见所知是：小说、诗、戏剧，达到伟大的境界，屡见不鲜，散文达到伟大的境界，还未见过，而木心的散文，例如《哥伦比亚的倒影》等篇，无疑是达到了伟大的境界。

再回到前面，我曾说这个“异数”是双重性质的，浅显地界分，第一重“异”在其自身禀赋，第二重“异”在环境遭遇，《散文一集》证见第三重性质：艺术成就上的“异数”，而它正在发展中，全面的评价，远在将来，我相信是会越来越大的，那时，就觉得今天，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是一个值得回顾的日子。

喜剧·彼岸·知性

郭松棻：

讲一些比较概念性的东西，分两部分。先把木心的“散文”规范出一个大的框架，来与其他的散文家作映照。再是细节的各方面，我在阅读《散文一集》的过程中，记下的感想，等大家讨论时，带进去谈。

英国批评家戴维·达契斯（David Daiches），论詹姆斯·乔伊斯时，曾经说：乔伊斯的文学事业，是要逐步把自己跟生活绝缘起来，然后达到一个喜剧的境界。他说，这是乔伊斯毕生以赴的工作。接着，他就界定广义的喜剧与悲剧的不同，拿我们对世界的态度来讲，悲剧家总是要想参与，想分享这个世界，得到他应有的一份，占有欲非常强。反之，喜剧家呢，他放弃了这世界，不要他的那一份，退为全然超脱的旁观者。悲剧，也就是说那个作家时时意识到他在世界上的位置，喜剧家就不再顾念他在人间的一席之地了——达契

斯认为，乔伊斯，便是一位伟大的喜剧家。

如果这样的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觉得，木心的散文世界，就是一个喜剧的世界。

我自己打比喻：悲剧是走兽，狮虎在地面步行搜视。而喜剧呢，是飞禽，鹰鹫在高空翱翔俯瞰——这便是我自己在木心的散文中感觉到的，他，是个属于喜剧的能手，他描写很多事件事物，总是一笑而过。这“一笑而过”，我以前也跟杨泽谈到，总的印象，木心是个苦中作乐的作家，再苦再惨的事情，他根本不执著。一执著，就过分哀伤，过分去强求它的意义，甚至过分去强求生命了。上帝，为什么，为什么？木心不是这样，不屑这样。如果以中国的思想家来比，他接近于老子，或庄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神、自然，是无慈悲的，哲学家对生老病死不过分忧戚，但并非冷感，他是另外一种体识。木心的散文就像鹰鹫凌云，很轻捷地飞过去了。他是一个时间空间的神游者。别人看不懂，以为他是中国人里最阔绰的旅行家，世界各地都走遍。是的，他在文字里是一个现代寰球旅行家，而心境上呢，

在鸟瞰世界各地的“人”与“事”的时候，他轻快地嘲笑。

“轻快的嘲笑”，这是爱默生讲的。他说：“愚蠢的人祈祷，天才是轻快的嘲笑者。”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木心很接近爱默生的这句话。不但如此，他的世界，与爱默生的世界也似比邻（这话题看等一下能不能再提到）“轻快的嘲笑”，这是很难办到的，你笑得不好，读者就觉得走了板，那就无从谈起了。而木心在“轻快的嘲笑”这样的冒险中，有一个东西支撑着他，不使“轻快的嘲笑”流于失败，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我觉得，贯穿在木心的散文世界中的那个强力的东西，我把它叫作“彼岸性”。

木心作为散文家，一个非常独特的素养，与五四以来绝大多数的散文家不同的是：木心有形上的生活，也就是说，在木心的冥想沉思中，他求得很远，他远远地达到了“彼岸”；但是他在落笔的时候，却又不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彼岸消息，而调弄的却是“此岸”零零星星琐琐碎碎的题材，但就在其中，隐藏着那个“彼岸性”。我觉得，成

功的时候，它是魅力最大了的。那么，拿哲学家的词汇来讲的话，木心作为一个“主体”，他对“客体”对世界的反应，建立了层次非常繁复的思维习惯，一句写下来，或一句连接另一句，所产生的层次契机，普通的散文家是不可能做到的，甚至不敢去尝试的。“彼岸性”，如果作“回归”解，那么，他的文章中常常带出非常强烈的“回归”的讯息，也就是从“彼岸”而来的讯息。这又怎么说呢？一般的散文家，特别是中国的散文家（其实对小说家、诗人，我也有这种感觉）他们都只是从“此岸”看“彼岸”，因此他们的笔调，或者心情，总是向往的，感叹的，赞仰的，觉得那么多灿烂多美丽。写英国的一条河啦，写普林斯顿的秋天啦，这种东西，作为一个读者，我的感觉早已经麻木了，很难起反应了。而木心相反，他着笔轻淡，但言外之意始终在观念的异域中怦怦叩动，所以我觉得木心前程无量，我看到了正在发展着的向度和远景。

木心有一种哲学的思维习惯，其实他跟德意志的形上生活非常接近。从哥德，一直过来，到

近代的赫塞，他们晚年在压轴性的杰作中，都写一个人，从青年走向世界，经过漫长的历程，终于成熟。德国的文学家、音乐家，他们都擅长一种所谓“成长的小说”、“成长的音乐”。而德国的艺术家，在最成功的时候，就是从“彼岸”归来的时候。前几天，木心也谈起，使我醒了一下，他谈瓦格纳。瓦格纳到了《帕西弗尔》，才归真返璞。那么，帕西弗尔就是已经从彼岸归来的人。但是他再回到现实的世界时，与在原地的人所认知的现实世界是不一样的了——我觉得也可以用这个，来形容木心的散文世界，虽然他还只发表了《一集》，还没有到瓦格纳写《帕西弗尔》的时候，我想，我们也预见到木心将写出他的《帕西弗尔》来。

从“彼岸”到“此岸”，如果在十九世纪，那还是容易达到的，就像十九世纪的英国的诗人，华兹华斯，他觉得“孩童是成人的父亲”，说得很真。对的，他从“彼岸”回来了，找到了。那么二十世纪之不同于十九世纪的是，我们自己找不到这句话。木心，我觉得他可贵的是：他从“彼

岸”回来，不提早告诉读者说，他找到了，然后像华兹华斯那样说出一个警句来。他并不那样做。也就是这一点，以及其他的个人原因和时代原因，我认为木心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这“理想主义”应该放在其次，谈他的散文，还得先说他是一个知性主义者。他的知性找不到归宿，我觉得他一直找不到归宿。唯其这样，才使读者，像我这样的读者，引起共鸣，如果一下子给我答案，我就不会看下去了。中国的很多散文家，写的都是情理中的事，看了这句，读者就可以预计下面要讲什么了。而木心的背后有一个“知性”，或者推动着他，或者衡定着他，所以他不写情理之常的事，而不时给我们意料之外的东西。这样，他的写法和别人的写法，就河水井水判然而分了。

我觉得，“知性主义”，还不能概括木心的全貌。用我的话来讲呢，他是“知性主义的怀疑论者”，为什么我要加上一个“怀疑论者”呢？一般的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理想主义，是“主体”看“客体”，非常自觉的，我是一个“主体”，我在看我的生活，看我的历史，看我的童年，或者，看

别人的故事。这种主体性的强烈意识，我觉得就是十九世纪以来知性主义者的最大的基盘，从而构成知性主义的散文世界——但是木心已经不是这样，用我的一个公式来排列，就是：先把这个“主体+客体”用括弧括起来，而在前面再加一个“主体”——主体（主体+客体）——也就是木心的第二个“主体”，才是构成他“知性主义的怀疑论者”的一个特点。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主体”在看“主体看客体”。所以我觉得他写到自己的经历时，他的第二主体在看，在嘲笑，嘲笑自己，同时也嘲笑到历史的时刻，这才是他散文精髓之所在——我的感觉如此。他的“主体”已经多退了一层。木心的这种“看”法，衔接当代的、目前的哲学思潮，从存在主义以来，法兰克福学派、解释学，他们都已经有这样的自觉，只可惜我们中国人迟迟不能发展这种精神——木心的散文，就有这一点。这可能就是使我兴奋不已的地方，也可能就是使一般中国读者不喜欢或者看不到的地方。

那么，连接着这一点，再回到刚才我讲的，